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区域旅游合作丛书
Shiji Haishang Sichou Zhilu yu Yanxian Guojia Quyu Luyou Hezuo Congshu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再出发

21Shiji Haishang Sichouzhilu
Guangdong Zaichufa

■ 司徒尚纪 著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区域旅游合作丛书
Shiji Haishang Sichou Zhilu yu Yanxian Guojia Quyu Luyou Hezuo Congshu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再出发

21Shiji Haishang Sichouzhilu
Guangdong Zaichufa

■ 司徒尚纪 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再出发 / 司徒尚纪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70-0340-1

I. ①2… II. ①司…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广东省 IV. ①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4657号

出 版 人: 刘志松

策划编辑: 官 顺

责任编辑: 官 顺 黄罗婷

责任校对: 李瑞苑

封面设计: 邓传志

责任技编: 刘振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再出发

21SHI JI HAI SHANG SI CHOU ZHI LU, GUANG DONG ZAI CHU FA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8号银政大厦西楼12楼)

邮 编: 510180

电 话: 020-87348243

网 址: www.tourpress.cn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坂田吉华路505号大丹工业园A栋二楼)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第一章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独特条件	1
一、濒临南海，世界海运一个中心	2
二、众多港湾	3
三、丰富的海洋资源	4
四、常年吹贸易风	4
五、历代中央政府对广东从不闭关	6
六、岭南文化风格的历史作用	8
第二章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	13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14
二、先秦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	15
三、秦汉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辟	17
四、三国到南朝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18
五、唐代梯航万里“广州通海夷道”	20

六、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	23
七、明代海禁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	25
八、鸦片战争宣告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结	29

第三章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33

一、促进广东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34
二、广东融进欧美市场	43
三、加快广东城镇体系产生及其区域效应	46
四、海陆丝绸之路的对接	50
五、广东商帮集团的兴起	52
六、中外文化交流在广东的重要贡献	68

第四章 广东再出发的优势 131

一、厚重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	133
二、强大的经济实力	135
三、广东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一个中心	137
四、华侨华人的巨大潜力	140
五、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	142

第五章 广东再出发的战略与对策 151

一、制订科学合理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规划	152
----------------------------	-----

二、以广东沿海港口群为依托，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廊	155
三、调整广东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	156
四、进一步重视华侨华人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作用	157
五、高度重视和发展新海上丝绸之路旅游	158
六、加强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宣传教育	159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161

第一章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独特条件

广东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港口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省区，与广东独特的地理区位、众多港湾、常年吹信风，以及中央政府对广东特殊的政策，加之岭南文化风格有很大关系。如此众多的有利因素，造就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独领风骚数千年。

一、濒临南海，世界海运一个中心

在中国沿边五大海中，南海是最大的边缘海，位于北纬 $3^{\circ}11'$ ~ $23^{\circ}15'$ ，东经 $98^{\circ}00'$ ~ $120^{\circ}15'$ ，南北跨纬度 20° 多，东西经度 22° 多。南北长约1600千米，东西宽约1212千米，呈“东北—西南”走向的菱形或称“U”形。面积约350万平方千米，约是渤海、黄海、东海面积之和的3倍。平均水深1212米，最大深度5559米。南海这个地理区位和幅员，全在热带范围之内，故海洋生物量最大，一年四季可以航行或从事生产作业，包括沿海采集、养殖、海上捕捞等，海产最丰、海洋文化发展也最盛，比之亚热带或温带四季分明的东海、黄海、渤海等，实胜一筹。

南海入海的主要河流有中国的珠江、越南的红河、湄公河和泰国的湄南河等。其中珠江由西江、东江、北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网河水系组成，径流丰富，仅次于长江。西江源于云南曲靖马雄山，长2055千米。珠江经由虎门、蕉门、洪奇沥、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八口归海。此外，在中国境内独流注入南海的尚有韩江、榕江、漠阳江、鉴江、九洲江、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南流江、大风江、钦江、北仑河等。这些河流腹地纵深广阔，连接中国南方大部分省区，不但带来大量冲积物沉积于河口和沿岸地区，形成大面积河口三角洲（如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漠阳江三角洲等）和滩涂，以供耕凿和海水养殖、增殖，而且作为海陆相连的纽带，也为海上贸易、中外文化交流发挥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珠江水系经广州附近的扇形地理格局，珠江河口区海、河动力强大，河流输沙量少，流量大，水深，造就了千年不衰的港市广州，使它拥有十分

宽广的陆向和海向腹地，荟萃天下货物，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转口贸易的强大物质基础。按照大江大河必有大大城市的原理，其他江河出海口，也形成规模不等的海上贸易中心城市，如汕头、深圳、珠海、澳门、阳江、湛江、北海、钦州等，星罗棋布于南海海岸线上。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海洋文化特质之鲜明，甲于中国其他海区沿海城市，与广州一起，共同组成广东海上丝路港口城市的体系。广东这个临海区位优势，恰如维新变法主要人物、近代中国文化大师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指出的：“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孔道。……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基于这个区位优势，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又说，“广东，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具有独立思想，进取之志”。这都奠定了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处于特殊地位的地缘基础。

二、众多港湾

港湾是海洋的一部分，根据地质构造、地貌背景和海岸动力等条件及其组合区域差异，南海北部具有山地溺谷、台地溺谷、潟湖、河口和人工港湾等类型港湾48处，约占全国沿海可建港址总数的30%^[1]。这些港湾大部分水深，纳潮量大，沉积物少，可建设为良港。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列入开发建设的即有广州、钦州、汕头、电白、海口、汕尾、海安、榆林港等。此后，港湾建设时有兴衰，改革开放以来始形成蓬勃发展之势。这些港湾背靠中国大陆，拥有辽阔陆向腹地，同时拥有范围更为广大的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乃至环太平洋等海向腹地。借助于海上丝绸之路，我国与这些海区国家和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贸易往来，形成“以海为商”的海洋商业文化模式和传统，成为南海海洋文化特质最彰显的一个表现，也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长盛不衰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支持。

三、丰富的海洋资源

南海不但拥有丰富的海水化学、动力、海洋生物、滩涂、海岛、港湾、旅游等资源，而且近年随着海洋科技、海洋勘探技术进步，油气资源相继被发现，部分被投入开采。据有关报道，在南海至少可以找到200个油气田，已探明可采石油总储量约为200亿吨，天然气储量约为4万亿立方米^[2]，并且近年这些数字不断被刷新。南沙群岛由于油气资源丰富而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在南海北部大陆架，则有珠江口盆地、北部湾盆地、莺歌海盆地、琼东南盆地、台湾浅滩南盆地（台西南盆地）等油气田，有的已在开采，有的在勘探，前景非常好。一批石油重化工业也在沿海港湾城市崛起，出现像茂名、湛江东海岛这样的石油城。海洋石油工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实力的经济产业。广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油气资源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也是支持这条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强大后劲所在。

四、常年吹贸易风

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南海盛行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吹西南风，已成为风向规律，古代称“信风”。中国人早就利用季风扬帆南溟，从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所以又把季风称为“贸易风”，夏季风称为“舶棹风”。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还写过一首诗《舶棹风》，内曰：“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说明至迟从宋代起，中国人假道南海的商贸活动非常兴旺，“以海为商”的海洋商业文化达到相当高水平。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指出：“自宋以前，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食其利。”元代吴莱在《渊颖集》中更指出：“广海在南服万里，为天子外府”，指的是朝廷对广东海上商贸税收的严重依赖。明清以来，海上商贸活动更频繁，给沿海地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食语》提到：“广州地区商人‘其黠

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蹕二洋，忽攸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清同治二年（1863年）广东巡抚郭嵩焘奏曰：“广东之富，在商不在农。”海上贸易令岭南富庶可见一斑。这点连远古时舜帝都极为赞美，《古诗源》引述《孔子家语》“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3]舜帝这首《南风歌》隐喻着对南海将带来经济利益，改善民生的祈望。近年，人们把有华侨港澳台关系称“有南风窗”，意亦指依赖于海上贸易或来源于海外而致富。

当然，南海也是世界台风最频繁的海区之一，影响南海的台风平均每年有14个左右，有产生于南海的“土台风”，也有发源于菲律宾以西的太平洋台风。土台风范围小，强度弱，但风向多变，难以预测其登陆地点，且来势猛烈，在气象学上称“非常态台风”，给海上作业和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威胁。但生活在南海周边的中国人民，像熟悉季风一样了解台风，并创造了适应台风的文化模式。例如采用矮脚稻种，防止被台风吹拂而倒伏；在沿海或村落、橡胶场周边种植防护林，尽量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在台风肆虐以后，很快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保障海上贸易有充足货源。另一方面，岭南人对台风见惯不怪，大海的波涛造就了他们敢于和善于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岭南沿岸“人多以舟楫为食”“逐海洋之利”，其人“习海竞渡角旺”^[4]“粤东滨海地区，耕三渔七”^[5]，成为沿海居民共有的海洋文化品格。故著名地理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教授提到：“炎黄文化，众流所宗；岭南亲海，热带民风。”^[6]既总结了南海热带海洋对岭南历史文化的作用和贡献，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其他省区的差异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大规模入侵中国，主要是取道南海爬上中国海岸的。在这段以剑与火写成的中国近代历史上，在传入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时，在南海也留下一些以西方人姓名命名的英文地名，如中沙群岛礼乐滩称为ReedBank，Reed为英国船长。东沙群岛北卫滩和屏卫滩称为North Vereker和South Vereker。此中Vereker亦为英国船长（Hon F. C. P. Vereker）；南沙群岛乐斯暗沙，乐斯即为英国海军上尉V. H. Iys；又南沙雄南滩1885年被定名为Marie Louise Bank，Marie Louise即为拿破仑第二个妻子（1791-1847年）。南海诸岛

(1983年)有252个岛、礁、洲、暗沙、暗滩,粤、琼、桂三省区沿海500平方米以上海岛达1758个^[7]。这些岛礁不少是海上交通港口、导航、补给设施等所在,在连接岭南与海外诸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南海海洋文化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五、历代中央政府对广东从不闭关

广东(历史上包括海南)属海陆区域,跨热带、亚热带,加上地形影响,又兼具寒带、温带、亚热带等垂直地带性特点,形成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复杂的地理环境。水、土、光、热和生物资源极其丰富,为人类驯化生物品种、捕捞水产,创造丰富多样的物质文明提供强大后备基地,所以古人说广东“兼中外之所产,备南北之所有”^[8]。除了在广东本土出产的以外,还包括通过南海海上贸易从海外得到的奇珍异宝,以满足中央王朝对这些物品的需求。另外,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之源,从晋代起,广州就有“天子南库”之誉。这类依赖南海及其商贸而致富之例,史不绝书。兹可列数例。

如果说舜帝《南风歌》“阜吾民以财兮”还带有某种传说成分的话,那么到商代伊尹制定《四方献令》,对南方各民族“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9],则已成为事实。南方大部分处南海之滨,南海中特产多种宝货。春秋时,楚国强大,降服粤人,即称“无求于晋”,因得南海宝货之故。另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关于越人公师隅条下说:“时三晋惟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魏”,为越王勾践复国而集南海珍宝献魏,此事后见出土《古本竹书记年》。秦始皇在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即发兵50万,平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部分原因是利越人之犀、象、珠玕。汉初赵佗立南越国,很重视海外贸易。《史记·主父偃传》曰:“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外市,故赵佗、章邯得成其私。”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非洲象牙、波斯银盒即为南越海上贸易兴盛的旁证。汉代番禺(广州)为全

国性经济都会，《汉书·地理志》提到：“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晋代广州有至爪哇航船，50天一往返。泰康二年（281年）大秦国（东罗马帝国）来广州献火布。《晋书·吴隐之传》称“（广州）一篋之宝，可资数世”；五代时，《南齐书·王琨传》云“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即广州海关收入甚肥，三千万不在少数。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远至东非，广州海向腹地甚广。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攻克广州。黄巢上表请为岭南节度使即归顺不反，唐僖宗不许，认为“贼得益富，而国用乃屈”^[10]。可见南海贸易获利甚巨，为唐帝国主要收入来源。南汉刘龚政权，虽偏安岭南一隅，但颇注意发展外贸，故府库充实。《南汉书·黄损传》云：“广州‘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龚时首都兴王府（广州）修离宫别苑数百所，所耗巨资，几取之于海上贸易所得。宋代南海商船横渡印度洋，阿拉伯商人来广州经商的甚多。宋广州东、西、中三城，比唐代大四倍，又开新南城区，其资金一部分为阿拉伯商人捐赠。元代通商规模又比宋大，陈大震《南海志·船货》称“珍货之盛，倍于前志所书”。明清海上贸易兴旺，清代广州十三行出现国际性富商，如伍浩官、潘正炜家族，年贡皇银5万~15万两，举凡皇帝大寿、军费、治河等费用亦靠行商。无怪郑和说：“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于海上，危险也来自海上。”^[11]这已为南海海洋文化史所验证。这些事例显示，南海贸易为封建王朝提供大量财源，故中央政府对岭南一直采取保护开放政策，即使明清闭关锁国之时，也或明或暗开放广州口岸，维持海上财源不致中断。隋文帝平陈之初，在《安边诏》中令：“南海诸国使人欲来京邑（指今南京），所有船舶沿溯江河，任其载运”^[12]，对海上贸易采取开放政策。岭南地区更不例外，隋在广州港建南海神庙即为对外开放一个最好例证。唐代比过去更加开放，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颁布《定夷舶市场例敕》，内云：“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船至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13]进一步明确了广州商民开始与外国商人贸易。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始有“安南市舶使”记载。市舶使职能类似海关，安南市舶使也是岭南道的市舶使。对外海上贸易专门机构的设置，显示唐政府对岭南海上贸易重视有加，极大地促进“以海为商”的岭南海洋商业文化的繁荣。在广州出现专为阿拉伯商人聚居而设的“蕃坊”，即为海外文化在岭

南传播、立足的见证。

宋元一秉唐代对外开放政策，故有上述广州商业繁盛。明代出于防倭和断绝逃亡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余党与内地联系，在中国沿海严行海禁，只准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实行朝贡贸易，但对广东却有例外，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入广东贸易，出现“番舶不绝于海溢，蛮夷杂递于州城”^[14]繁荣景象。嘉靖中，由于各种原因，“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荐广东市舶司”^[15]。南海诸国与中国贸易“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16]，以及“凡夷船趁贸货物，具赴省城（广州）公卖输税”^[17]。同时规定“广州船舶往诸蕃出虎头门，始入大洋”^[18]。内地商人只好将货物运到广州后再出口，称曰“走广”。到隆庆六年（1572年）部分开放海禁后，“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19]。这些特殊政策使广州成为与南海诸国等交易的唯一通商口岸。入清以后，虽然也实行海禁和迁海政策，但广东仍有人铤而走险，走私贸易仍很猖獗，保持南海对外通商贸易。康熙中，沿海局势安定，废除海禁，设粤海、江海、浙海、闽海四个海关为对外通商口岸，粤海关居四关之首，税收至丰。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又封闭闽、浙、江三个海关，规定“蕃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20]，这个规定后来又被强化。自此，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通商唯一口岸，直到鸦片战争结束。

综观历代中央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对广东实行各种特殊开放政策，保持南海海上贸易强大通道从不间断，由此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等效应，也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海洋文化形成及其特质异于其他海区海洋文化的一个优势背景和强大动因。

六、岭南文化风格的历史作用

岭南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包容性，造就了广东的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吸引外商在广东登陆，留居。

（1）外向性。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者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

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上的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海上交流借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广东文化的外向性特质。

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海居民生活物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21] 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这种文化完全是外向型的，是海丝文化外向性的一个范例。

(2) 开放性。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流，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的特质之一。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广东却因区位、政策等因素，始终保持对外开放状态，故广东人早就不断假道海洋，迈出国门，走上与世界各地交往的道路，吸收海外先进文化，滋润壮大自己，形成远胜于内陆的岭南文化海洋性风格。恰是得益于这种文化风格，广东才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有声有色，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3) 冒险性。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苏东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22]，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23]。琼州海峡自是一道巨大的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跨海越洋，仍有许多风险，包括狂风恶浪和海盗的剿杀等。在这种海

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是它的一个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24]。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25]。活跃在南海洋面上的著名海盗商人集团就有广东张璠、陈祖义、澄海林道乾、潮州林凤等^[26]。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就是指在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两广华侨漂洋过海在侨居地开拓、拼搏，即冒着极大的海洋自然和人为艰险。广东广府、潮汕、客家商帮集团常年往来于各大海大洋之间，靠的也是这种冒险性。

(4) **崇商性，或曰重商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与事实相反的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5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在长期经商中形成的粤商集团，以经营舶来品著称，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就是一个舶卖洋货之地。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外地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时代潮流，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的一种折射。它已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东接受世界经济转移和对外辐射的一种强大原动力，也是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显著优势。

(5) **多元性。**《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江河与大海对接使海洋能接受多种文化成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

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互相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著名人文地理学者北京大学胡兆量教授云：“广东是世界上历史文化十分复杂，因而也是十分典型的省份，加上海南岛，自成一个历史文化区，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27]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江海相通、海水强大亲和力等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广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由此形成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即为多元文化融合产物。

(6) 包容性（兼容性）。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明末西风东渐以来，由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现、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

实际上，岭南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因海洋文化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然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的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之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在中国传统四海之中，南海最大，这些文化特质无疑彰显得最为完备、充分，也最有代表性，因而历史上广东中外商旅云集，不同种族、肤色、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在广东尤其是广州和而不同，共生共存共荣，相互友好地相处发展，恰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精神的体现。